

走近上海首批“组团式”援藏教师

三年任务一年完成，在雪域高原上与时间赛跑

7月18日，上海首批40位“组团式”援藏教师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教育援助任务，回到上海。而西藏那头，他们对口援助的日喀则市上海实验中学，喜讯频频传来——

今年高考文理科上线率都达到100%；9人考取内地西藏初中班，是去年的一倍；小学毕业班学业水平测试在日喀则市的排名从去年的第36名一跃至今年的第5名……这些数据，均创出历史新高。

在海拔3800米的雪域高原，很多上海援藏教师会出现头疼、失眠等症状。为了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他们起早贪黑，仅用一年时间基本完成原计划三年的教学管理任务——他们，是一群与时间赛跑的人！

■本报记者 沈淑莎



在日喀则市上海实验中学，上海市上南中学南校的援藏教师王剑平和学生们在一起。上海“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供图

这一年，“白手起家、白首而归”

一年前，出发在即的浦东新区工读学校老师薛丰华，想了解一下自己即将参与援建的学校——日喀则市上海实验中学。而在网络上搜索后，他只搜到一张学校大门的照片。可以说，上海首批“组团式”援藏的40名教师，连援藏老师住的地方都要自己找；后半句指的是，短短一年，已让年仅37岁的他长出了不少白发。

“我们一来就发现，藏族孩子学习非常刻苦，他们对知识的渴望绝不比内地的孩子少。但由于缺少老师，缺少高水平的教育，他们的分数普遍不高。”傅欣说，来到藏区，教师们认真刻苦的状态，颠覆了老师们的想象。日喀则属于藏区腹地，一年中的许多时间，这里风很大、很冷，孩子们不得不窝在教室里，通常早上6点

半开始学习，到晚上10点才结束晚自习，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课堂上。让傅欣感慨的是，孩子们虽然学得如此刻苦，但成绩却不理想，因为他们的学习效率太低了。

提高教学效率，成了上海援藏老师提高日喀则市上海实验中学教学质量的突破口。学校里，出现了很多新规定。比如，上新课前，老师要求学生必须复习前一课内容；有时，老师还会为学生提供“一课一练”等辅助练习，帮助学生巩固已经习得的知识点。

一个学期下来，孩子们花在课堂里的时间少了，成绩反而提高了。可是，空下来的时间做什么？上海援藏老师们带去了“上海教育”的模式：组织藏族孩子们在学校开设学生社团。

在这所学校，唐卡社在上海援藏老师抵达之前就有，可惜，现在社团大门已经关闭——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开放过了。“主要是没有老师。”杨浦区业余大学教师张斌正好是美术老师出身，虽然入藏前没有接触过唐卡，但为了重新启动这一社团，他认真地

学习了唐卡知识，并编出了《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系列校本课程——唐卡艺术》。很快，20多个对美术有兴趣的孩子，在课余时间跟着张斌学画唐卡，一个学期下来，他们已画得有板有眼了。

援藏教师薛丰华爱好摄影，入藏时带了不少摄影器材。他和几位老师一商量，带领学生们创立了摄影社团。老师们把自己的器材分给藏族孩子，让他们用镜头去发现、分享家乡的美好。

当听到学校要成立女子足球社团时，好多女生都很积极。原来，踢足球是藏区孩子们最喜欢的运动，不过到了初中年龄，一些学校就只有男孩子能踢足球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体育老师薛强和田林第三中学体育老师赵冀辉从全校报名的女学生中挑出20多人，组建了高原第一支女子足球队，通过专业知识的传授，女孩子们已经熟练掌握传球、带球、射门的技巧。

社团活动如此丰富，会不会影响孩子们学习？赵冀辉做了一个统计，参加足球社团的孩子中，90%以上的学习成绩都有所提升。

日以继夜，只为留下可复制的“上海模式”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抑扬顿挫的古诗词朗读声回荡在3800米高的雪域高原上，汉语的美感感染着每一位朗读者。

其实，语文教学原本是藏地语文教学中一个难点。而援藏教师团中最年轻的、来自上海市曹杨中学语文一级教师汪思翔，却凭借一腔热情，让课堂教学有了很大改观。原来，不少藏族孩子觉得文言文背诵起来很困难，经他一教，很多孩子们喜欢上了文言文，学习热情大大提高。

除了平时的课堂教学，上海援藏老师们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把

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学经验留在西藏——留下可复制的“上海模式”？

于是，汪思翔决定白天上课，承担语文教研的各项工作。到了晚上，他开始奋笔疾书，把教学心得记录下来。在几百个因为高原缺氧而头疼的夜晚，他笔耕不辍。一年来，汪思翔编写了逾84万字的《高中汉语言文学教学参考材料》、《高中汉语现代文教学参考资料》等4本教师用书，以及《高考汉语百题大过关》等2本学生用书。

眼看一年援藏即将结束，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教研员方文晶还在坚持给藏族老师做培训。面向藏区本地教师的培训，从上海援藏老师入藏的第一个月后就开始了，雷打不动。记得刚到西藏时，关于“到底是培养本地教师，还是

顶岗上课”，上海援藏老师之间时有争论。不少人认为，指导并带动当地教师发展更重要。而方文晶觉得，如果援藏老师只搞教研，不去上课，难以让当地老师信服。试想，没有亲临一线，援藏老师们怎么可能编写出适合当地的教案呢？！

于是，听一线老师上课，累积经验编写教案，成为方文晶开展教研工作的重点。日喀则市上海实验中学里有200多位藏族教师，以前除了偶尔参加市教育局组织的培训和学习，区域教研和校本教研几乎没有。方文晶相当于在平地上起高楼。经过一番系统思考，他抓住了“三定”——定时间、定地点、定教师，让参加教研讨论成为当地老师的一种习惯。

不舍离别，新团队踏上新征程

“刚来时每天都很想家，真要离开时却舍不得离开这里了。”杨浦职业技术学校老师刘刚是“组团”来到西藏的40名上海援藏中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刚来时，他上下楼大喘气、整夜整夜睡不着，半年里瘦了13斤。而现在的他，皮肤黝黑，对日喀则市的道路、商店，甚至比上海还熟悉。他已经主动申请，将援藏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这也意味着，在短暂回到上海后，7月份他又将来到这片雪域高原。

为什么要留下？刘刚腼腆地笑着说：“还有事没做完。”原来，刘刚主管着日喀则市上海实验中学的后勤和德育工作。走进这所学校，乍眼一看，这里窗明几净、草木繁盛，而实际上，不少教学设备已经老化，断水断电更是常事。为此，刘刚常常要扛着买来的矿泉水爬好几层楼，气喘吁吁地送到老师和同学手

中。为了让师生的学习环境更上一层楼，多个学校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中。这里，离不开他。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上海市徐汇中学总务处副主任王唯一，推开了学校一间正在改建教室的门。原来，这间教室是援藏教师们自掏腰包20万元建造的互联网多功能教室。“将来，这里会有个大的LED屏，孩子们能看到上海共康中学、珠峰中学的上课情景，教师们也能从别的老师的教学方案中得到提高。”

互联网不仅连接起了上海与日喀则，还连起了江孜、拉孜、定日、亚东、萨迦这5个日喀则的下属县。郭树宝是西藏江孜冈行中学校长，他也要在西藏服务三年时间。“相对来说，下属县的教育条件更加艰苦，我们招收了很多牧民的孩子。”郭宝树说，以前，当地教师要跋山涉水去下属县当

驻地老师，现在随着“智慧校园”工程的启动，多个远程互动教室正在建造中，下属县的师生们也有望借助互联网，及时领略上海教师、上海援藏教师的教学风采。

傅欣心中有一张日程表，用三年时间建立起一套规范的教育体系：即使把这批上海教师日后离开了，好的教学成果也能源源不断地产生。不过，在这群与时间赛跑的上海援藏老师的努力下，这个体系花了一年时间，就已大致完成。他们不仅留下了课本、教案、教室等“实物”，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教研思路、教育模式甚至上海教育的影响力。现在，人们再在网上搜索日喀则市上海实验中学，相关结果已有38万个。

对上海的援藏教师们来说，工作永无止境，短暂休息后，新的团队又将再踏上征程。



上海市老港中学的援藏教师赵林钧和学生们在学校操场上。上海“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供图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学校的援藏教师张新宇正在给学生上物理实验课。摄影 李立基

学者观点

没有休闲的孩子 无法在学习道路上走得太远

■周彬

说到孩子们的学业负担，作为一种现象，人人都觉得，似乎有些“过量”了。但具体到孩子上什么班、补什么课，很多人又觉得，都是应该学的，没有什么减得下来。

这种情况在教育界并不例外。对待教育现象，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在具体的教育问题面前，不管是面对学生，还是面对自己的孩子，绝大多数人都束手无策。

因此，把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视为目前亟需解决的教育问题，这是大家达成的共识；但究竟如何减，这就不只是态度或者认识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没有深刻了解教育本质，就难以定位学校教育，就更难引领教育培训机构，从而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教育格局。

我们把应试教育赶出了学校，而它却依然在培训机构和家庭中游荡，远离了学校教育的规范。

教育是一项漫长的事业，也是一个“慢”的事业。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需要大量投入，但又是一个不能急于获得回报的事业。按照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观点，似乎所有对外的教育目标的设定，都是对教育本质的反叛。教育是促进孩子成长的事业，而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用具体指标来衡量的，也不能把孩子的成长局限在具体的指标或数值上。

于是，学校中的纸笔测试、学生的考试成绩、学生的班级排名等传统的教育质量指标，都成了应试教育的“帮凶”——它们要么被禁止，要么被弱化，成了教育领域中那只人人喊打的老鼠。

当然，对考试成绩的弱化，对成绩排名的禁止，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推进素质教育的业绩。哪所学校不再追求学生的考试成绩，也不再对学生成绩进行排名，似乎这所学校的素质教育就搞得越好、办学理念就越科学。我们完全把曾经引以为荣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当成了今天学校教育的对立面。

可是，当我们把应试教育都赶尽杀绝了，素质教育在学校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吗？把昨天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取消了，就给我们树立了更科学的、更有希望的评价标准和希望了吗？

曾几何时，为了促进小学素质教育，我们在多年前就取消了“小升初”考试，希望小学能够彻底摆脱小学应试教育的压力，从而更充分地实施素质教育。的确，今天的小学应试教育的成分小了，素质教育的成分大了，孩子们对学校的感觉肯定比以前更好了。可是，学校不搞应试教育，没有了对成绩的依赖，没有了成绩排名，学生就真的解放了吗？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学校里，我们取消了应试教育的形式，但并没有真正取代应试教育的质量标准。我们把应试教育赶出了学校，而它却依然在培训机构和家庭中游荡，并且脱离了教育行政部门的约束，远离了学校教育的规范。由此一来，对孩子们的伤害反而更重。

因此，再美好的教育理想，再科学的教育理念，都要在教育实践中生根发芽，都必须形成自己的质量标准，去引领和督促学校和家庭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走下去。没有清晰的质量标准，完全由学校或者家长的教育觉悟来决定，不管是美好的教育理想，还是科学的教育理念，都只能“纸上谈兵”。

与之相反，哪怕那些已经被明令禁止的教育质量标准，在没有被科学的质量标准取代之前，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不但没有被禁止而消失，反倒因为被禁止而显得更神秘，更让人恐慌。

试问，送孩子去某数学竞赛辅导机构的家长，有几个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数学天才？送孩子去某英语培训机构学英语的家长，有几个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语言天赋？之所以早早把孩子送去培训机构，不是因为相信孩子的天赋，也不仅仅是出于攀比，更主要的是内心的恐慌。

在没有标准判断自己家的孩子好

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去，并不是基于孩子的成长，而是基于孩子的成绩；不是基于对孩子未来的希望，更多的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恐慌。

尽管大家都在送孩子去培训机构的路上，但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条路应该继续走下去。完全可以想象，没有休闲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无法走得太远。

教育培训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以人的成长作为服务对象。利润是企业之本，但对孩子可持续成长的关心，则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利润之源，更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良知所在。



与不好时，我们不能比谁家的孩子更优秀，那就比谁更愿意为孩子付出。当然，我们并不主张用一个标准来让大家竞争，但我们一定需要一个标准，来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做出引领。

学校不能再一味退让的方式解决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问题，而要用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专业的做法，引领和指导学生的学习。

尽管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但是这些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如何生成的？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个变化是：从学校的课业负担，向校外的课业负担转变；从单纯的学校教育问题演变成了复杂的社会问题。

既然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那么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思路就要转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要重新建构。

原本放在学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变得有些难以掌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只在学校里面解决问题，没有把学校的教育价值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样反倒成为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应试教育提供了时间和机会。所以，要解决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不是要强化学校教育，而是要强化化学化教育，让学校教育更加专业化、更加科学化。

当学校是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生产者时，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就是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减少学校的教学时间，减轻学生的家庭作业。可以这么说，通过对学校层面的深度治理，尽管学校教育水平有了多大的提升，大家还是有争论的，但对学校内部补课现象的治理，对学校课后作业的规范，取得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学校在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上的退让，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倒是让出了学生课余生活的指导空间，为各种各样社会培训机构的大举入侵提供了机会。当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只是学校教育问题时，这个问题还能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规范，还会受到学校自身教育理念和专业伦理的制约，可一旦这个问题进入繁杂的社

会，并由各种培训机构引入市场机制以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大。

当前，学校不能再一味退让的方式来解决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问题，而是要用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专业的做法，来引领和指导学生的学习，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需要明确的是，学校积极的态度，并不是恢复昔日广为诟病的补课，也不是加大课余作业的数量，而是要在教育理念的引导下，要在评价标准的设置上，真正体现学校教育的专业价值。学校教育不但应该是一种主流，更应该是一种主导。但目前，占领学生制高点的主导，主导学生方向的主导，培训机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声呼唤，学校教育应该挺身而出！

为什么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应该是主流，学校教育应该是主导？是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学生，他们需要的是能力的提高和素质的提升。尽管知识与技能也不可忽视，但这个阶段获得知识与技能的主要目的，不是参与社会生活，而是借此转化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的提升，要用科学的教育理念引领学生学习的方向、主导学生的学习过程。

所有的培训机构，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得了“合法性”，激发了家长们的送学动机，如果它们失去了“合理性”，这种动机就不可能持续下去。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教育培训机构的“饥饿营销”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学生培训会“凌驾”到学校教育之上，甚至对学校的招生产生负面影响……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学校教育的“示弱”导致的，还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好强”形成的？但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肯定是不正常的，是大家都无法接受的。

尽管，很多家长都在送孩子去培训机构的路上，但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条路应该继续走下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没有休闲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无法走得太远。

让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的动力是什么呢？曾经家长们对学校补课的指责，对学校应试教育的批评，现在没有了。如今，家长们不得不带着孩子去教育培训机构补课，而且补课还得按照市场标准甚至“超市标准”收费。要知道，对很多家庭来说，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难道教育培训机构是在实施素质教育吗？家长们送孩子去培训机构真的能够提高孩子们的能力和素质吗？当孩子在学校有不良表现时，还会有老师的关心，还会有同学的帮助；可是在学校，那些没有上过培训班的孩子就会被事先培训过的同学“欺负”；要是你在培训机构没有学好，那就证明你还需要接受更多的培训；要是你在培训机构学好了，那就更能证明接受更多的培训具有价值。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荒谬的竞争中，在这种恐惧与恐慌之中，培训机构才获得了“合法性”。

但是，所有的培训机构，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得了“合法性”，激发了家长们的送学动机，但如果它们失去了“合理性”，这种动机就不可能持续下去。

诚然，教育培训让一些家长和孩子尝到了一点“甜头”，比如，帮助孩子掌握一些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习得一些学习方法。但从长远来看，教育培训市场要健康发展，必须对孩子的成长有一个精准定位，要把孩子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培训的出发点，并以此作为教育培训机构使命。

教育培训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以人的成长作为服务对象。除了获得利润之外，还应该比其他商业机构或者上市公司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利润是企业之本，但对孩子可持续发展的关心则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利润之源，更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良知所在。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